

# 湖南省古籍保护工作 简报

2014 年上期 (总第 10 期)

湖南省古籍保护中心主办

2014 年 8 月 25 日编印

---

## ●【信息速递】

四省联盟古籍保护与整理培训班在江西省图书馆举行.....	2
与专家一同品鉴何绍基家族书画艺术的魅力.....	2
简讯八则.....	3

## ●【工作交流】

湖南图书馆“古籍修复演示、拓片制作体验”活动.....	4
湘潭市图书馆馆藏古籍、字画的来源与现状.....	6

## ●【学习心得】

愁喜苦乐“克复堂” ——修复《湘乡颜氏克复堂账簿》小记.....	8
记武冈隆回普查之旅.....	10

## ●【麓山书话】

清代及民国间湖南刻书工价.....	12
唐怀素自叙帖.....	14
黄自元录宋文天祥《正气歌》.....	15

## ●【信息速递】

### 四省联盟古籍保护与整理培训班在江西省图书馆举行

5月5日至9日,湘鄂赣皖四省图书馆联盟馆员交流培训会首站在南昌举行,主题为古籍保护与整理。湖南图书馆派出刘雪平、刘冬、蒋江龙、颜胜、李娇五人参加了此次交流培训,另还有来自其他三地的20余名馆员一同参与。

6日上午,开班典礼如期举行,江西省图书馆馆长周建文发表了题为“江西省图书馆管理工作”的精彩讲话。接下来的培训,课程设计合理,重点突出,有天津图书馆古籍部主任、国家古籍保护专家委员会委员李国庆给学员们讲授图书馆古籍保护与整理;江西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学科评审组组长王琦珍漫谈古籍整理工作;江西省图书馆副馆长何振作剖析古籍中地方文献的利用。授课专家耐心答疑,内容精彩纷呈。馆员们虚心学习,并各自介绍本馆古籍工作概况,相互砥砺,汲取先进经验,取长补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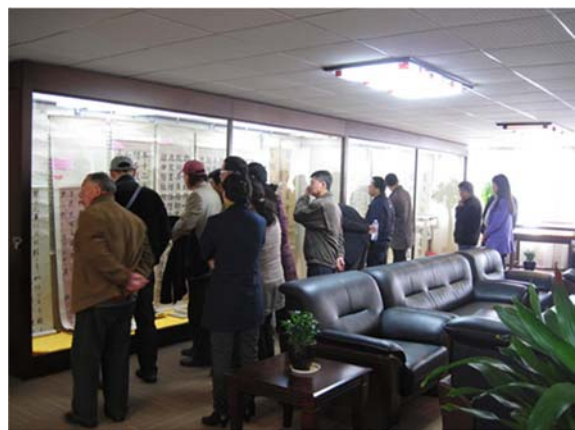
湘鄂赣皖四省公共图书馆联盟成立于2013年5月,共有423家省、市、县级公共图书馆,总服务人群达到2.3亿。联盟有效地整合了四省公共图书馆资源,在协调文献采购、培养专业人员、建设数字图书馆、交流办馆经验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此次培训班为2014年度湘鄂赣皖四省图书馆联盟馆员交流培训会的成功举行开了一个好头。  
(刘雪平)

### 与专家一同品鉴何绍基家族书画艺术的魅力

3月16日至18日,湖南图书馆在古籍鉴赏室举办了“道州何氏书画鉴赏会”,集中为大家呈现何氏家族奠基人何凌汉、中期掌门人何绍基及其同胞兄弟何绍业、何绍祺、何绍京等人的罕见书画作品四十余幅,其中半数以上展品系首次面世,价值甚高。

道州何氏家族,是清代中晚期一个声名显赫、以书艺享誉中外的重要文化世家。从一代名儒何凌汉开始,中继以何绍基兄弟,一直到其曾孙何维棣、何维朴,绵延一百二十余年,前后涌现出十余位书法名家,开创了一代书艺新风,形成了中国近代史上



一道奇异的文化景观。

鉴赏会开幕当天，著名书法家、书法教育家、湖南商务职业技术学院教授贾铎老师做客湘图讲坛，结合何氏自述及曾国藩、钱穆等众多名人对何氏书法的评价，解读何绍基书法的渊源和艺术特点。此次活动采用讲座和展览互为配合的形式，灵活新颖，得到了众多读者的广泛关注，对读者进一步感受和了解湖湘文化起到了积极作用。

（何文君）

## 简讯八则

4月17日，湖南图书馆副馆长、湖南省古籍保护中心副主任雷树德赴北京参加“省级古籍保护中心工作会议”。

4月21日至24日，湖南图书馆馆员彭日红赴天津图书馆参加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举办的“第三期全国珍贵古籍数字化培训班”。

5月21日，全国古籍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主任、研究馆员李致忠，故宫博物院图书馆研究馆员翁连溪，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管理组洪琰组成的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专家组来湖南图书馆调查馆藏雕版情况。

5月23日，黑龙江省图书馆原党委书记、常务副馆长董绍杰，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黄润华，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管理组组长王沛组成的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专家组来湖南图书馆考察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人才培训基地申报情况。

5月28日至30日，湖南图书馆副馆长、湖南省古籍保护中心副主任雷树德赴北京参加由文化部与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举办的“第一期全国古籍保护工作管理人员研修班”。

5月底，湖南省第五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申报工作圆满结束，本次共申报古籍213部，雕版1种。计有省内5家单位参加，即湖南图书馆古籍137部，雕版1种；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图书馆51部；湖南师范大学图书馆17部；常德市图书馆5部；浏阳市图书馆3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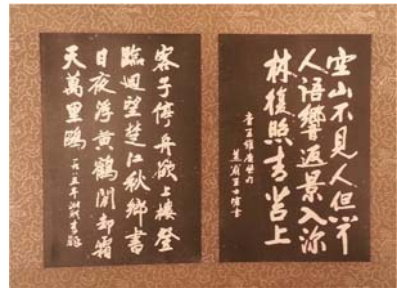
8月11日至9月12日，湖南图书馆馆员张惟蔚赴山东省图书馆参加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举办的“第五期全国古籍修复技术培训提高班”。

8月18日至9月26日，耒阳市文物局刘素娟赴甘肃省图书馆参加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举办的“第十六期全国古籍修复技术培训班”。

## ●【工作交流】

### 湖南图书馆“古籍修复演示、拓片制作体验”活动

2013年，湖南图书馆以古籍修复组人员为核心，全年共开展了8次古籍修复演示、拓片制作体验活动。这一系列活动主要包含了古籍修复演示、古籍常识介绍、拓片制作、雕版印刷演示等内容，在读者与省内媒体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较好地宣扬了传统古籍修复技艺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时也对外宣传了湖南图书馆在古籍保护工作中所做出的重要贡献。



本活动是湖南图书馆古籍修复工作人员首次与普通读者面对面近距离接触，打破了修复工作“养在深闺人未识”的传统，是开放、务实、创新等服务理念的集中体现。

活动开展之前，部门领导与修复组工作人员举行了数次活动筹划工作会议，确定了部门主任作为活动负责人、修复组工作人员作为活动执行人、部门副主任作为活动监管人的分工方法，并为活动的顺利开展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包括安排活动场地、活动时间；准备相关工具和材料；布置宣传海报，进行信息发布等。

在成功开展了数次古籍修复演示活动后，部门领导与修复组工作人员总结经验，反复商议研究，决定改变纯粹的演示与宣讲的活动方法，代之以大众感兴趣的亲身参与的体验方式，让读者动手操作，亲身体会拓片制作、雕版印刷等传统技艺的魅力，以吸引更多的普通读者参与其中。



该方案一经提出就得到了馆领导的大力支持，先后为部门购置了传拓所需的石碑、棕刷、宣纸等工具材料，使得演示活动的形式更加多样，内涵更加丰富，活动的参与人数更是直线上升。



活动中，工作人员及时在湖南图书馆的微博、论坛、水牌上发布相关信息，并对后续活动的开展方式和开展时间进行了预告，使更多读者了解到该系列活动的开展情况。这一系列

活动也吸引了省内多家媒体对古籍修复工作的关注，长沙晚报、三湘都市报的记



者对修复组工作人员进行了多次采访，湖南公共频道《市井发现》栏目还对湖南图书馆的古籍修复工作进行了专题节目的拍摄，



有效地提升了湖南图书馆的社会影响力。



活动的开展也使工作人员在业务知识水平、读者服务能力等方面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修复组施文岚、张惟蔚、颜胜同志作为活动执行人，认真地参与每一次活动，为读者展示古籍书页虫洞的修补、脆裂糟朽书页的托补、线装书的装订、拓片的制作、雕版印刷等内容，他们还积极与读者互动，不厌其烦地重复演示，同时耐心地为读者介绍古籍相关知识、图书馆馆藏情况等，得到读者的一致认可与好评。

开展此系列活动的经费不足 2000 元，但是却吸引了数千人次的参观和体验，

开展此系列活动的经费不足 2000 元，但是却吸引了数千人次的参观和体验，



亲手参与拓片制作及雕版印刷的读者达到了千余人次，在读者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参与体验的读者一度排起了长队，经常有读者迫不及待地询问下一次活动的举办时间，这说明活动本身对读者来说具有一定的吸引力。很多读者表示，古籍修复演示活动让他们对图书馆的馆藏、职能有了全新的认知，丰富了他们的古籍知识。



知，丰富了他们的古籍知识。

通过对读者的调查，我们了解到，只参加一次活动的读者对活动本身印象不深，而参加过两次以上活动的读者就会关心下一次活动的时间、内容等，多次参加活动的读者就会形成一个特定的兴趣群体，主动询问活动的安排工作，甚至有读者提出愿意来当志愿者，充分融入到活动中来。



正基于此，我们认为古籍修复演示活动已经达到了我们举办该系列活动的根本目的，既使许多读者对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统古籍修复、文献传承技艺产生了兴趣，又使读者对图书馆的工作有了新的认识，了解到图书馆除了借书、还书之外，还承担着古旧文献保护、修复、文化传承等方面的工作，有效地提升了图书馆在广大读者中的形象。 (颜胜)

## 湘潭市图书馆馆藏古籍、字画的来源与现状

湘潭市图书馆始建于1954年7月，是湖南省解放后创建的第一个市级公共图书馆，其开馆时的藏书、设备和人员均来自原湖南省南岳图书馆。1955年迁入大同北路（今建设北路）新建馆舍；1960年迁雨湖路；1984年再迁湖园路新建馆舍，建筑面积5,238平方米。藏书40万册，其中古籍1.6万余册，字画、碑拓数百件。

### 一、湘潭市图书馆与湖南省南岳图书馆的关系

首先有必要回顾湘潭市图书馆与湖南省南岳图书馆的关系，因为当时获取古籍最为便利的可能就是新建的湘潭市图书馆，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据原湖南省中山图书馆职员宁南勋撰写的《从南岳图书馆到湘潭市图书馆》记载：在林柏森（兼）馆长的领导下，湖南省南岳图书馆于1953年8月10日开馆。“南岳图书馆楼上存有1951年南岳土改时由各乡收集的线平装书81,472册（内含佛经三万余册），原中正图书馆藏有线平装书31,381册，1952年夏由省文物委员会拨来线平装书37,241册，合计线平装书150,094册（系根据南岳文物馆图书目录统计），这些藏书由南岳管理局安排刘范猷先生负责保管。”南岳图书馆开放不久，湖南省人民代表开会，有代表认为“把图书馆建立在南岳，藏书于名山大川，对读者利用藏书不便”，“省文化局根据代表们的意见，决定将南岳图书馆迁移。先打算迁衡阳，并把数十箱古旧线装书运去，放在某小学一间教室内，占有整个教室，老师叫苦，不得不改二部制上课。衡阳文教科苦无房屋，派专人去省里要求拨款解决基建费问题。省文化局有困难，无法资助，转来湘潭派樊世华同志进行联系，湘潭领导答应解决房子问题，于是省文化局发出通知[1954年5月19日（54）文社字第266号]，决定南岳图书馆迁移湘潭。”为此，“胡真局长亲临南岳，召开组长会，江达平、欧阳逵和我三人参加”，胡局长指示：1、南岳图书馆的藏书中的“善本书约三至五千册交由省中山图书馆保存，那里条件好，有良好的设备和专人负责保管；衡阳已运去一部分古旧线装书，做为那里的基本藏书；其余部份可挑选一批运去湘潭做为新馆的基本藏书，剩下的复本、残本以后去研究。至于在南岳添置的新书可全部运去湘潭做为藏书。”2、设备家具：“由于国家财政还很困难，局里经费一样紧张，无法增拨设备添置费，应尽量把南岳图书馆现有的，能够用得上的全部家具运去湘潭开展业务。”3、人员问题：“南岳馆10人都随馆到湘潭去工作，局里不另行安排。”“7月20日以后，清理古旧线装书工作已结束，南岳馆工作人员除刘范猷、姜慧君未来以外，（江达平、欧阳逵、宁南勋、唐佐方、王前元、何励忠、周召辅、蒋泰生）都陆续到达湘潭。”成为湘潭市图书馆的开馆八元老。

因 1954 年湘潭市图书馆新馆还未兴建，临时馆址条件不好，加上搬家时正好遇上湘江大洪水，故“只是运来在南岳时添置的新书，刘范猷先生赠送的新书，四部丛刊和古旧平装书共 13,739 册。而古旧线装书呢？欧阳逵同志认为天气不好，这里藏书条件差，下次运不迟，一拖再拖，后遂无人问津”。所谓“无人问津”当与后来人事变更有很大关系，至 1958 年从南岳馆来的职工大多已调离，仅剩 2 人。

## 二、湘潭市图书馆的古籍来源及途径

1956 年，湘潭市图书馆迎来第一批古籍入藏，即接收湘潭市文化馆移交的古籍线装书 5,005 册，这批书系原湘潭县民众教育馆藏书。

1964 年，处理古旧线装书 3,217 册。其中湖南省中山图书馆调拨该馆线装书 1,444 册，同时换回《万有文库》第二集 953 册，补充 9 种地方志。另外，1,773 册作废品处理。

1966 年文化大革命运动兴起，“破四旧、立四新”的浪潮有如洪水猛兽席卷全国。文物古迹、古旧图书字画均列入“四旧”的黑名单，属于横扫之列。原湘潭市图书馆职工谭国才在《“文革”时期我馆的收集工作与教训》一文中回忆：“砸祠堂、毁古庙、打菩萨的队伍浩浩荡荡，一篓篓、一捆捆的古线装书；一张张、一幅幅古字画被抄了出来，堆放在街道办事处里、公安派出所里、露天坪里、造纸厂里、废品仓库里。有的已被无情的烈火吞没。”“图书馆是图书文献资料的收藏单位，是保存和传播知识的阵地。作为一名图书馆的文化工作者面对这些被毁或即将被毁的人类精神财富态度如何呢？是麻木不仁，视而不见呢？还是挺身而出，去加以抢救呢？我们选择了后者。当时我和馆里的宁南勋同志、卢琳同志每天到各街道办事处、派出所去了解情况，只见这些地方到处堆放着抄来的古线装书、古字画碑帖，堆着像小山一样高，都将准备烧毁或送废品站。我们拿着介绍信和工作证向有关组织负责人宣传：‘图书馆是有责任为国家保存有参考价值和历史价值的正面或反面图书文献资料的任务，希望得到你们的理解和支持。’在有关人员的帮助下，我们在古书堆中挑选好的完整的版本，一套套、一卷卷、一叠叠的扎好，字画碑帖就一捆捆的捆好，用板车一车车地拖回来。到废品站，我们在准备打包或正在打包的古旧书籍中拣出比较完整的书籍、字画，再过秤从废品站买回来，或用废报纸兑换。还有单位打电话通知我们，说他们单位抄出好多‘四旧’图书资料，问我们要不要。如商业局一位科长就要我们拿回了几千册图书。眼望着堆满库房、走道、卧室旁我们拉回来的图书资料，我们心里可真是乐滋滋的。”

湘潭市图书馆在“文革”期间，从本市街道办事处、派出所、废品站、造纸厂等地共收集抄家、没收、变卖的古旧图书、字画碑帖逾万册（件），成为馆藏

古籍、字画的最主要来源。

1979年7月，湘潭市《辞源》编写组移赠给湘潭市图书馆古典书刊资料3,938册。

1985年3月至4月，为落实“文革”期间湘潭私人收藏家龚侗南家藏书画的遗失情况，由市委宣传部和市文化局派员与湘潭市图书馆一道对馆藏16,934册线装书和506件字画进行了为期15天的清理，将其中盖有龚氏印鉴的图书155册、字帖1册、字1幅、扇面画1件退还龚氏之子龚大成。1986年7月，市落实政策办公室、市委宣传部分、市文化局会同本馆开会讨论处理本馆“文革”期间收藏书画的清退工作。8月21日至31日举办“文革期间丢失书画资料参观认领会”，共展出了标有私人印记的556册书和18幅字画，接待认领人员42人。从1980年至1986年，本馆先后进行5次清退工作，共清退线装书1,177册、字帖1册、字1幅、扇面画1件。

### 三、湘潭市图书馆的古籍、字画现状

湘潭市图书馆目前共收藏古籍1,360种，16,538册。善本较少，其特色是百余种湘潭地方人士的著述，如陈鹏年、张九钺、王闾运等。1995年编印《湘潭市图书馆馆藏古籍目录》，2005年修订重印。馆藏古籍中有代表性的善本有：《初学记》三十卷，（唐）徐坚撰，明嘉靖十三年（1534）刻本。入编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卷首页钤有济南马国翰“玉函山房藏书”印，长沙徐树铭“臣树铭印”、“徐氏寿衡”印，以及“刘氏惟喆珍藏”诸印。《湖广通志》七十六卷，图考一卷，（清）徐国相修，（清）宫梦仁纂，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刻本。《奇经八脉考》一卷，（明）李时珍撰，明万历三十一年（1603）刻本。字画有明解缙书法，清何绍基、曾国藩、王闾运等对联书法，齐白石绘画，以及部分当代名家书画作品。碑拓未整理，内容不详。（文鸣）

## ●【学习心得】

### 愁喜苦乐“克复堂”

#### ——修复《湘乡颜氏克复堂账簿》小记

《湘乡颜氏克复堂账簿》是一套咸丰年间的手稿本，实际上是湘乡颜氏家族咸丰元年至五年的家用账簿。咸丰年间的颜氏在当地是个有田有地、家底殷实的大家族，全套共五本账簿都记载着颜氏家里出租、借贷、帮工、收支出入的流水。可能是当时记帐时间不同，五本账簿的长宽尺寸均不一样，分别为26.4×22.3cm、25.6×24.5cm、25.7×24.5cm、26.4×22.3cm、26.5×22.5cm。封面上有三列文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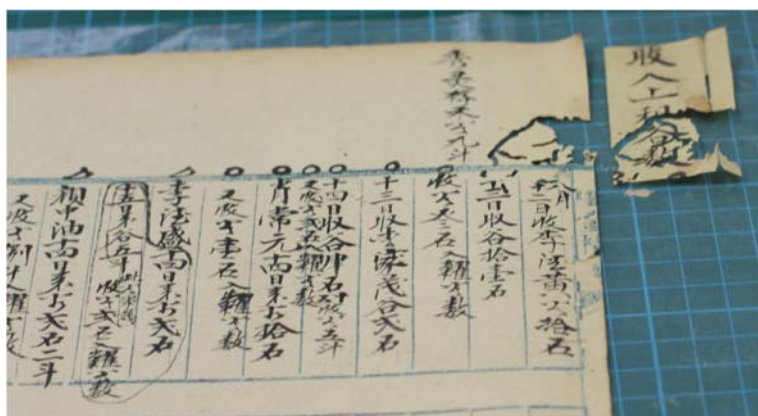


右列为“克复堂记”，中列为“咸丰□年□月立”，左列为“出入流水”，每本的封面所用字体不一。书页的中缝上鱼口处印有寓意财富极多的“堆金积玉”四字。五本账簿都严重破损，且每本都有不少人为的撕毁页，需要用空白纸接上。书中随意夹着不知从哪里脱落的小签条，还有几张更可怜的已“身首异处”了。这都得一一找齐，拼好断裂的小签条，再把小签条找到它以前的位置贴好，不然就是一本“乱账”。应该从哪着手呢？这真个是叫人“愁呀——”



我理清好思路，选了一个天时地利人和的黄道吉日，开始了修书。我正襟危坐，屏息凝视。一页页的翻，一小片、一小片的收拢好残片、甚至是只剩下半笔的小纸片。“妈呀——我这要到哪里去找另外的一小截呢？”我满心像蚂蚁爬，

“嗞嗞”地痒。我平静好烦乱的心情，继续找，继续拼。然后根据当年记账的时间、地点、人物，依据记账先生用毛笔划出的圈圈，顺着原来藕断丝连的痕迹将它们拼好，贴好。我想这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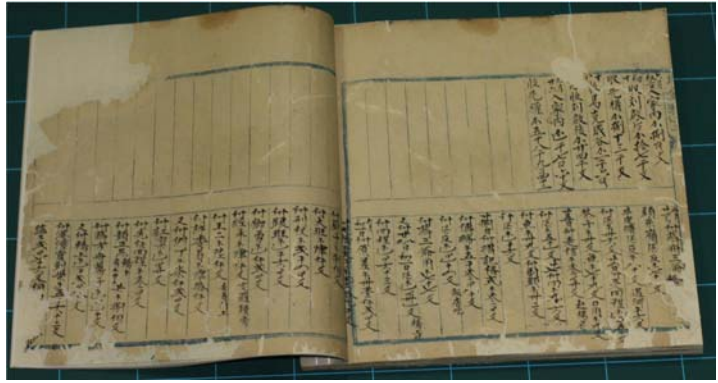


些又在一起了的小签条们心情也一定很欣慰，自己心中也是一阵阵地窃喜。

四张记有帐的护页，已经磨损成絮状。要保证完整的从原书页上取下来，要保证完整的喷水摊平，还要保证能够完整的托在托纸上，我大气也不敢出。一不小心，它就弃你而去了。好不容易摊平了书页，上浆水的时候，你得小心侍候着，握紧毛笔，蘸好浆水，不能太多，也不能太少。手心在冒汗，手腕也有些发抖，笔尖轻轻点上去，絮状的绒毛，它猛地一抽搐，一下子就卷了起来。此时你的心也就跟着被揪了起来，针刺一下的痛。像这样的，就很难再摊平了，你就是喊它祖宗，也不灵。“我的祖宗哎——”

第四本账簿的封面已板结成腊状，和护页胶着在一起，我先用热湿毛巾敷了一天，揭不开；用蒸笼蒸，还是无动于衷；最后边蘸热水，边搓，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把有字的部分完整地保留了下来，但我那有“螺”的“金”手指，只怕也搓掉了。这真叫那个“苦呀——”

五本账簿经过大半年的时间，终于装订成册修完了。看着修复好了的五本账簿，我仿佛看见当年的记账先生笑眯眯边翻着账簿，边点头念叨着“就是这样子，就是这样子”。直到这时，我才如释负重，满意地笑了。



那个“乐呀——”只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才能体会得到！

（施文岚）

### 记武冈隆回普查之旅

2月26日，我们受湖南省古籍保护中心的指派，从长沙启程，开始了长达半月的武冈隆回古籍普查之旅。

武冈地处湖南西南部，素有“三省通衢，黔巫要地”之称。1939年，邑人周调阳有感于武冈地广人众，学校教育发达而未曾兴办图书馆，民众精神食粮供给困难，且抗战爆发以来，公私图书连连遭损，遂决定创办私立都梁图书馆以保存文献、启迪民智，并以私有藏书约六千册作为基本图书，以私蓄银币约三千元作为开办经费。在湖南省教育厅厅长朱经农的支持下，周调阳向县中缙绅发出邀请书，响应者甚众。旋即成立私立都梁图书馆董事会，武冈县教育局局长杨韶华任董事长，周调阳任馆长。经过筹划，借得县立女子中学的旧文昌阁房屋作为临时馆舍，稍加修葺后于1940年春正式开放。为充实馆藏，周调阳倡导各界人士捐赠图书，获书八千余册，又陆续购书若干，至1948年时，馆藏文献一万六千余册。今日的武冈市图书馆即是以私立都梁图书馆和民众教育馆的藏书为基础建立起来的，藏有古籍约二万五千册（包括万有文库、四部备要、丛书集成等）。

武冈市图书馆何国平馆长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并详细介绍了该馆的古籍普查工作情况。他说，全馆上下十分重视这项工作，古籍普查既有利于摸清家底，又有利于古籍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但专业人员的缺乏使得工作进展缓慢，停滞不前。在古籍室，我们看到书箱林立，有经部书三十余箱，史部书五十余箱，子部书十余箱，集部书二十余箱，另有地方文献、佛教经典若干箱。每箱放书三至五摞，均有书夹板。每书夹有卡片，上有书箱号、书名、作者、版本、册数等。但经我们查验，这些信息并不完全可靠，如作者一项，或用字，或用号，甚至将作序者当成了作者著录。有鉴于此，我们决定用书箱号/流水号的形式组成索书号，并将书按顺序放置，且尽量将一书的不同版本放置在同一书箱里，极大地方便了日后找书用书。确定了工作方案后，我们开始为每部古籍填写普查登记表，著录索

书号、题名卷数、著者及著作方式、版本、册数、存缺卷数、丛书子目等内容。其中，填写版本项最为头疼，判定版本不仅要有深厚的古文功底，而且要熟悉各个时期的纸张、字体、行款、墨色等特点。我们入行不久，经验尚浅，难以作出准确的判断，所以我们只能多看多查——看牌记、读序跋、查电子目录、对比电子书影，以期少犯错误。若仍无确切结论，我们就拍摄书影，留待省古籍保护中心的专家鉴别。与千方百计查验版本不同，数存缺卷完全是个耐力活儿。如《皇清经解》一千四百卷，存二百八十五册，在武冈馆工作人员的协助下，耗时良久，终于填写完存缺卷数项。再如残缺的丛书，抄写子目动辄就密密麻麻一张纸。经统计，该馆约有二成的古籍为残缺本。

埋头苦作至3月12日，武冈馆古籍普查登记工作终告一段落，共登记古籍一千三百余条，计一万三千六百余册。我们直观感觉，武冈馆的古籍保存得比较好，多数品相完好，但也有几册由于浸水导致全书被粘连在一起，根本无法打开，只能等有条件时由古籍修复人员抢救。藏书中不乏邓辅纶、邓绎、邓国瓛、邓琅等武冈人的作品集，当属武冈地方文献无疑。古籍的价值在使用中体现，相信《武冈市图书馆古籍普查登记目录》面世时能创造出更大的价值。

第二天，我们在何馆长的陪同下转战隆回，二馆人员在管理、经费等方面进行了经验交流。我们了解到，隆回县魏源图书馆全年无休，春节等节假日照常开放，每周开放时间达63小时，这让我们倍感意外。据隆回馆唐馆长介绍，古籍保护工作得到了县政府的重视，已着手购置新书柜、书夹板等。全馆上下曾集体上阵，为每部古籍填写了《古籍普查登记表》，著录甚详，包括古籍版式在内的等项均填写完毕。我们计划按原目逐一核对，加快工作进度，可原目无索书号，且与古籍摆放顺序不同，核对的工作量骤然加大。于是我们只好改变工作计划，重新填写登记表。经过三日的加班加点，三千余册古籍清点完毕，共登记三百余条数据。据我们粗略统计，一半以上为残缺本，且部分破损严重，亟待修复。

至此，武冈隆回古籍普查工作基本结束，但后续工作依然繁重——普查登记表需要专家审核，《中国古籍总目·湖南卷》、《湖南省珍贵古籍名录》等工作正待逐步开展。我们有幸参与古籍保护工作，尤其是奋战在第一线，与古籍实物打交道，收获自不待言，然而自身之不足仍让我们汗颜，如何快速地成长起来是我们面临的最大问题。王安石有云：“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有志矣，不随以止也，然力不足者，亦不能至也。有志与力，而又不随以怠，至于幽暗昏惑而无物以相之，亦不能至也。然力足以至焉，于人为可讥，而在己为有悔；尽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无悔矣，其孰能讥之乎？”借来形容我们的成长之路是再合适不过了，我们必定尽吾志、竭吾力，于人于己都不留遗憾。

（李娇）

## ●【麓山书话】

### 清代及民国间湖南刻书工价

刻工的劳动报酬既是维持个人生活的基本要件，也是书坊生产过程中的成本要素，每每影响了书籍的贩卖价格。叶德辉《书林清话》卷七“明时刻书工价之廉”载：“蔡澄《鸡窗丛话》云：‘先辈云：元时人刻书极难，如某地某人有著作，则其地之绅士呈词于学使，学使以为不可刻则已；如可，学使备文谕部，部议以为可，则刊板行世，不可则止。故元人著作之存于今者，皆可传也。前明书皆可私刻，刻工极廉，闻前辈何东海云：刻一部古注十三经，费仅百余金。故刻稿者纷纷矣’……按明时刻字工价有可考者，《陆志》、《丁志》有明嘉靖甲寅闽沙谢鸾识岭南张泰刻《豫章罗先生文集》，目录后有‘刻板捌拾叁片，上下二帙，壹百陆拾壹叶，绣梓工费贰拾肆两’木记，以一版两叶平均计算，每叶合工费壹钱伍分有奇，其价廉甚。至崇祯末年（1644），江南刻工尚如此。徐康《前尘梦影录》云：‘毛氏广招刻工，以十三经、十七史为主，其时银串每两不及七百文，三分银刻一百字。’则每百字仅二十文矣。今湖南刻书，光绪初元，每百字并写刻木版工费五六十文，中叶以后，渐增至八九十文，元体字小者百五十文，大者二百文，篆隶每字五文。至宣统初，已增至百三十文，以每叶五百字出入，每钱银直百六十文计，每叶合银叁钱畸零，视明末刻书已增一倍。然此在湖南永州一处则然，永州刻字多女工，其坊行书刻价每百字仅二三十文。江西、广东亦然。价虽廉，而讹谬不可收拾矣。”

据北师大图书馆所藏《清代名人书札》稿本，中有长沙徐树钧致陕西朝邑阎敬铭函十八通，涉及清光绪十一至十三年间阎氏委托长沙传忠书局经理刊刻《资治通鉴》一事。其中数札涉及湖南刻价及纸张：“承命重刻《通鉴》一事，面晤曹镜初名耀湘，据称，十月曾复函寄与彭稷初，尊处所寄刻书节略亦已收到。此间借得原本《通鉴》三部，缮写校对，足可应用。树钧详述尊意，托先写书样二叶，寄呈台览，如能合式，再行写刻。镜初又言：刻《曾文正集》，每百字制钱一百廿文，局用在外。此次刻价并校对薪水工食等项，每百字制钱需一百六十文，合计仍与曾集相等，通计约需银六千金，二年成功。镜初守道不阿，深入佛海，办事切实，可信任也。拨款一节，遵谕先由湘拨兑。兹有舍亲二人捐训导者（由部库上兑），共拨银（长沙平文）千两。尊款在晋，其余可由晋拨。镜初已向蔚泰厚说明拨用，但求中堂告知京都蔚泰厚将晋款拨付湖南可也。乙酉腊月廿日。”

“湘省钱价，每银一两，换制钱一千五百数十文，镜初所言每百字刻价百二十文，连局用校对之费，每百字合百六十文，即所谓每万字一切需费十两也。《通鉴》

约计六百万字，故约计六千金。正月二十五日。”“《通鉴》现已刻成五十本，刷出样本，仍须详校。曹镜初春来接丁内外艰，不暇兼顾，侄今年专任校对样本。前命将各色纸张价值查明，刷印寄京，兹特将每纸各刷印八页，并纸价、刷工、装订分晰开呈台览。现在长沙银一两换制钱一千六百文，以钱合银，照此核算可也。其纸以贵州皮纸为上，福建官堆三种俱佳，宝庆官堆质厚而价廉，均可用。宝庆毛边，即毛胎纸也，质太松，不耐翻阅。”

清宣统元年（1909）二月，长沙叶德辉致缪荃荪书信称：“湘中佣书人（案：抄书人）每字一千工资七十文，江南价即倍加。”1916年十月书信又称：“温州刻书价现今尚与湖南相等，每字一千不过洋一元。”（《艺风堂友朋书札》，198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

1934年4月15日湖南省中山图书馆向省教育厅汇报《定王台书板残缺及应补刊大概情形》一文记述：（一）全部未缺者有《庄子集释》、《韩非子集释》、《荀子集释》、《晏子春秋》、《盐铁论》、《潜夫论》、《水经注》、《释名疏正》。（二）此次补刊完全者有《曾文正公全集》、《五种纪事本末》、《古文辞类纂》、《续古文辞类纂》、《古诗源》、《孙渊如集》、《唐韵正》、《骈文类纂》、《泮湖文钞》、《八代诗选》。（三）正在补刊者有《方言》、《浮丘子》。（四）尚未补刊者有光绪《湖南通志》，计残缺及虫伤者欠二千二百余块，每块约六百字，以三十元一万字计算，计需洋四千元。《湖南文征》，计残缺及虫伤约四千块，每块约六百字，以三十元一万字计算，需洋七千元。《十三经注疏》，计残缺及虫伤约欠三千块，每块约一千字，以三十元一万字计算，计需洋九千元。《玉函山房丛书》，计残缺及虫伤约欠一千块，每块约四百字，以三十元一万字计算，约需洋一千元。《通鉴辑览》，计残缺及虫伤约五百块，每块六百字，以三十元一万字计算，约需洋一千元。以上未补刊各书约需费补刊工资洋二万二千元。

清代湖南刻书很少有注明工价者，但一些寺观刻书由于多来自于募资、族谱印刷来自于集资，主持人为示公正，往往会在卷末注明费用。如清乾隆十四年（1749）邵阳《楸木双江王氏初修族谱》十卷首一卷末一卷，约30余万字，801页，刻费及板料、工匠一百七十五两，供给杂用七十七两三钱，纸墨七十三两八钱，壳料、箱子、装订六十一两五钱，共费三百八十七两六钱。清道光十一年（1831）续修时，刻费及板料、工匠三百五十二串六百文，供给杂用五百七十三串八百文，纸墨六百七十一串文，壳料、装订八十四串文。清乾隆三十一年（1766）湘乡《萧氏重修族谱》载：每部八本，谱版共计七百四十一页，梓师刻费二百四十五两一钱六分，书录校阅食用银一十六两二钱九分五厘，树价银一两一钱二分五厘，锯工价银二两五钱二分，纸笔墨费银三两七钱八分五厘，书录校阅聘金一十六两，杂项零碎一十二两四钱九分五厘，以上总共用费银二百九十六两三钱。清咸丰六

年（1856）《衡阳泰祉陶氏续修族谱》载：梓人钱玖拾余千文，纸墨笔钱八十余千文，棕油、梨木、木匠工价、食用钱八千文，谱箱拾千文，杂用二百千文。清同治八年（1869）邵阳《简氏续修族谱》十八卷，梓人工钱一百五十千七百五十文，谱纸七万张钱六十二千四百文，古连纸五十四合钱二千文，墨三斤八两钱二千五百二十文，纂修二人薪水钱八十千文，监修一人薪水钱三十千文。酒席、油盐、菜蔬、杂用等项共钱一百四十四千七百五十四文。1924年衡山《喻氏礼房五修族谱》十卷，梓人包修工费钱六百七十千文，梓人小费钱六千四百文，梓人牙祭钱九千六百文，湘包纸钱九千七百文，伙食杂用钱四百二十千文，执事薪水钱二百五十千文，开盘、告竣席费钱四十八千文。这对我们了解当时工价、材料费用，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寻霖）

## 唐怀素自叙帖

毛泽东晚年的草书飘逸而雄健、豪迈而灵变，透着超凡的气势，其随意挥洒、笔惊风雨的风格与他崇尚怀素的狂草不无关系。

作为中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书法艺术家，怀素的草书润笔圆劲有力而使转如环，奔放流畅而一气呵成，人们往往将张旭怀素并列，史称“颠张狂素”。

怀素，永州零陵（湖南零陵）人，生于唐开元二十五年（737），卒于唐贞元十五年（799），字藏真，僧名怀素，俗姓钱，是唐代著名书法家。因家贫，十岁就出家为僧，他在《自叙帖》言：“经禅之暇，颇喜笔翰。”因为买不起纸张，就找来一块木板和圆盘，涂上白漆书写。后来，觉得漆板光滑，不易着墨，就在寺院附近的一块荒地，种植了万多株的芭蕉树。芭蕉长大后，他摘下芭叶，铺在桌上，临帖挥毫。由于怀素没日没夜的练字，老芭蕉叶剥光了，小叶又舍不得摘，于是想了个办法，干脆带了笔墨站在芭蕉树前，对着鲜叶书写，即使酷烈的太阳照得他如煎似熬，刺骨的北风冻得他足皸手裂，他还是在所不顾，继续坚持不懈地练字。他写完一处，再写另一处，从未间断。这就是有名的怀素芭蕉练字的故事。因其好酒，怀素又被称之为“醉僧”，每当饮酒兴起，不分墙壁、衣物、器皿，任意挥写，故史上有“颠张醉素”的说法。

《自叙帖》，纸本，纵31.4厘米，横1510.0厘米，126行，共698字。首六行早损，为宋苏舜钦补书，从书体上看，前六行与第七行以下的相比，确有天壤之别，这在打开全卷俯瞰时，更加让人一目了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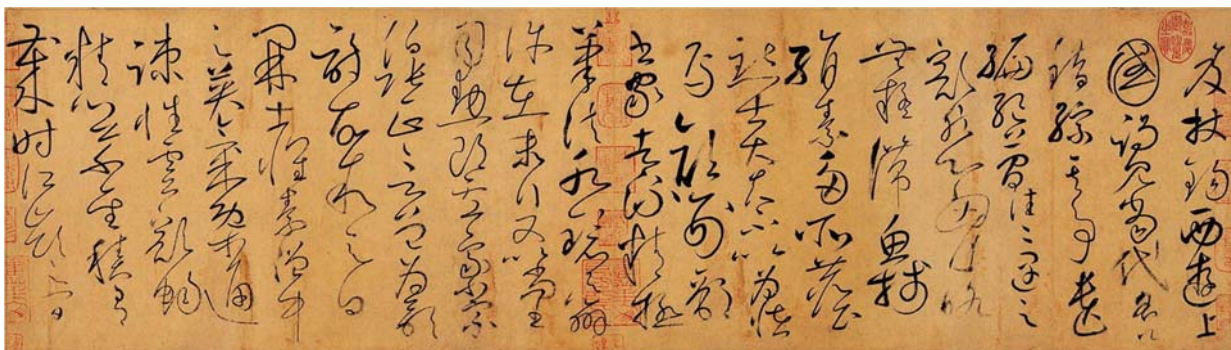
观《自叙帖》，通篇为狂草，笔笔中锋，所谓上下呼应如急风骤雨，纵横斜直无往不收，可见当年操觚之时，怀素豪情勃发的情景。一目读来，如同聆听美妙的音乐一般，伴着韵律的呼吸，时而高亢，时而低沉，急骤中蕴含着沉静，潇洒中内敛着沉稳。行距与字距，结合得当，忽左，忽右，忽上，忽下，看似毫无



定法，却营造出以极大空间，自在而空灵。随着整幅书法的驰毫骤墨般迈进，或重，或轻，或堆积，或宽松，或大开，或大合，充分调动了每个字的积极性。其用笔在整幅作品上始终感觉是中锋行笔，使笔性有了更丰富的变化，可谓八面出锋，在运笔的掌控下，以夸大实现视觉转移，其笔法做到了极致。

《自叙帖》曾经为南唐内府，宋代苏舜钦、邵叶、吕辩，明代徐谦斋、吴宽、文征明、项元汴，清代徐玉峰、安岐、清内府等收藏。帖前有明李东阳篆书引首“藏真自叙”四字，后有南唐升元四年（940）邵周、王口口重装题记以及宋李建中、杜衍、蒋之奇、苏辙、曾纘公、景晋同、赵令畤、富直柔，明吴宽、李东阳，清高士奇、乾隆等题识。钤有“建业文房之印”、“佩六相印之裔”、“四代相印”、“许国后裔”、“武乡之印”、“赵氏藏书”、“秋壑图书”、“项元汴印”、“安岐之印”、“乾隆”、“宣统鉴赏”等鉴藏印。据曾纘公跋称，旧有米元章、薛道祖及刘巨济诸名家题识，今佚。宋米芾《宝章待访录》、黄伯思《东观余论》、清安岐《墨缘汇观》等书均有著录。上海延光室、北京故宫博物院、文物出版社有影印本。原迹现藏台湾故宫博物院。

怀素传世的法帖，计有自叙帖、清净经、四十二章经、圣母帖、千字文、食鱼帖、苦笋帖、藏真帖、论书帖等。《自叙帖》作为中国历史上十大书法作品中排名第六的书法作品，也是最能代表怀素狂体作风的书法作品。（姜彦稚）



唐怀素自叙帖局部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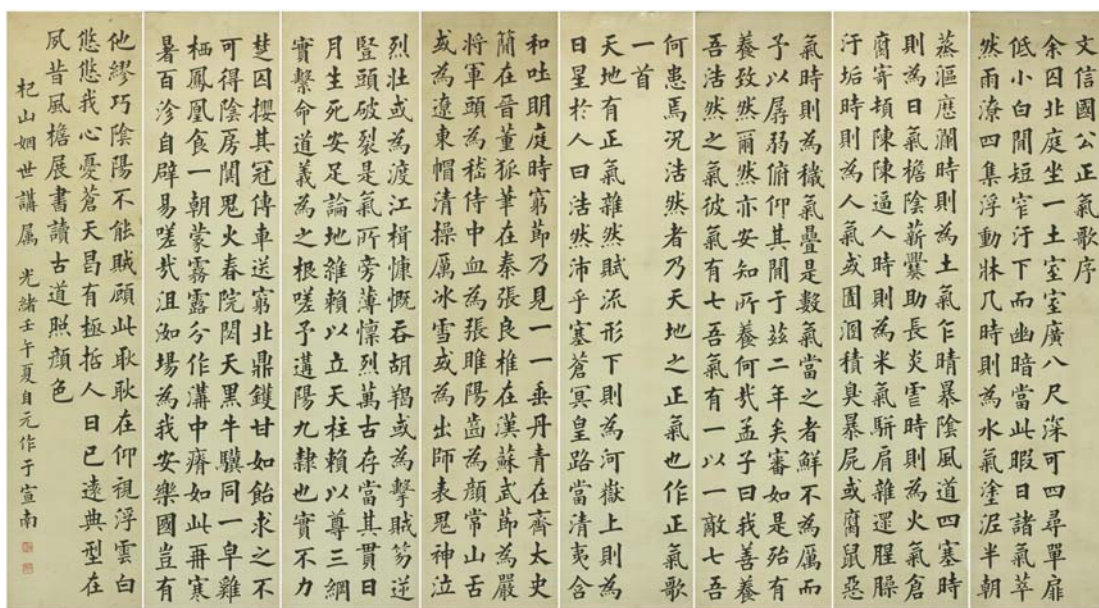
台湾故宫博物院藏

## 黄自元录宋文天祥《正气歌》

“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这首荡气回肠、慷慨悲壮的《正气歌》同文天祥的《过零丁洋》一样，千古流传。在今日的文天祥祠（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前院东墙上，仍然镌刻着这首著名诗篇，和那棵苍虬劲道的古老枣树一起，闪耀着永不屈服的斗争光芒。全诗一气呵成，浩然正气充塞其中，贯穿而下，诗句酣畅淋漓，气势滂沱，俨然滚滚大河奔逝而去，“试读此歌，言言若神鬼之泪，诚足沮金石而薄云天。”

这样气势恢宏的淋漓之作，如能配上银蛇狂舞的狂草，似乎能诗文俱绝，相

得益彰。然而这幅用楷书书写的《正气歌》，整肃严谨的楷书中裹挟着一种狂放不羁、喷薄而出的浩然之气，其实更得艺术的张力之美。这幅书法名作就是出自清末楷书大家黄自元之手。



“安化之黄，自元以来，多闻人，所居龙潭里，齐木蔚然，为邑巨姓。”晚清时期，安化黄氏就出了三位进士：黄德濂、黄自元、黄凤岐。黄自元(1837-1918)，字敬輿，号澹叟，湖南安化县龙塘乡人，清末书法家，实业家。清同治六年(1867)举于乡，次年殿试列第二，授翰林院编修。光绪年间，黄自元历任河南道、陕西道监察御史，简放甘肃宁夏知府。中日甲午之战，随湖南巡抚吴大澂出征，兵败牛庄，自海上逃归，再不出仕。其后定居长沙，先后主讲湘水校经堂及成德书院，担任过箴言书院山长。湖南新政时期，联合王先谦等在长沙创办了湖南第一家商办机械工业企业——湖南宝善成机器制造公司。民国七年(1918)病逝。

黄自元的书法艺术成就最为人称道的就是编著了《间架结构摘要九十二法》书帖。是书出版于光绪甲申年(1884)，书中详细地分析了楷书的间架结构，成为黄自元影响后世最为深远的代表之作。其时金石碑版书法泛滥，许多人放弃优良的帖学传统，取法民间，而这种作法走向极端，则将丢弃传统，破坏长久以来形成的中国书法法度，黄自元为张扬规范尚法的帖学传统而编著此书，并用规整有度的楷书书写了千古名篇《正气歌》，形成楷书的典范之作。

从《正气歌》的书法风格中，我们可以欣赏到黄自元端庄秀丽、内敛蕴藉的书写风格，他初学颜真卿、柳公权，接着师学二王，字体严谨有法，不偏不倚，整肃秩然，秀雅美观，博采众家之长，卓然自成一家，难怪有人评价说：“黄敬輿先生以书名海内，推何子贞先生后第一。”以其“内行之纯笃，蹈履之谨严，识量之超明，天怀之元定”，确能为后世楷书之标杆，成为人们竞相追捧的书法学习最佳蒙本。

(刘雪平)